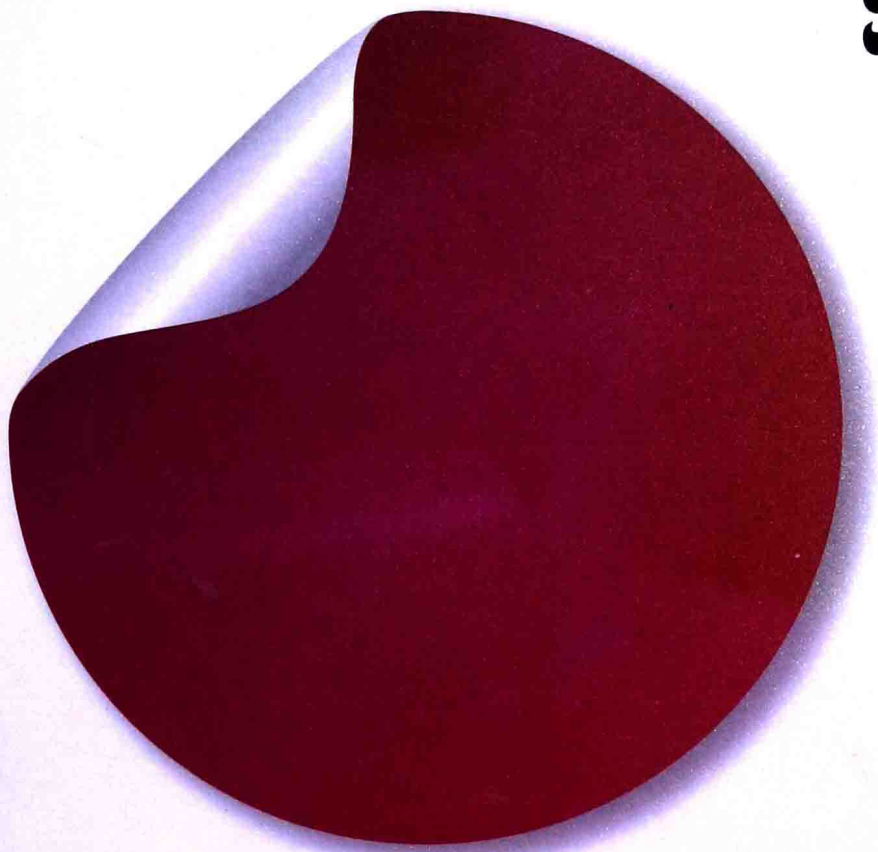


The Abe Political Economics
— The Gulf of Cosmopolitanism

一道世界主义的鸿沟

方明 李亚芬
袁跃东 伍伟烨 著

安倍 政治经济学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感谢睿信国际风险评估机构
对本书写作的专业支持和帮助！

安倍 政治经济学

The Abe Political Economics
—— The Gulf of Cosmopolitanism

一道世界主义的鸿沟

方 明 李亚芬
袁跃东 伍伟焯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倍政治经济学：一道世界主义的鸿沟 / 方明等著.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093-5625-8

I. ①安… II. ①方… III. ①政治经济学—研究—日本—现代
IV. ①F131.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3714 号

责任编辑：潘孝莉 (editorwendy@126.com)

封面设计：周黎明

安倍政治经济学：一道世界主义的鸿沟

ANBEI ZHENGZHI JINGJIXUE: YIDAO SHIJIE ZHUYI DE HONGGOU

著者 / 方明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 × 1000 毫米 16

版次 /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张 / 32 字数 / 490 千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7-5093-5625-8

定价：79.00 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网址：<http://www.zgfs.com>

市场营销部电话：010-66033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编务印务管理部联系调换。电话：010-66032926)

值班电话：010-66026508

传真：010-66031119

编辑部电话：010-66022958

邮购部电话：010-66033288

余闲居密云西湾子，望云起云落，星转斗移，历春夏秋冬，不知几多年，绵延长城，不知几人行过，茫茫然几近坐忘也！然时乎运乎，天下事历历，未必不在眼目，自然机理，未尝不暇思一二。偶有所得，也呼朋唤友，醉而论道！然得余心者，稀矣！或因量小，或因思浅，或因识短，或流表面，或因过专，居一隅而自傲者，比比。吾居中华，然天下事并不以中华论；吾居今日，天下事并不以今日论；吾之为我，天下事并不以我身为论。吾之论事，并不以此事论；吾居中华，亦盖非仅论中华，或就中华而论中华也。此何不谓奇也怪哉？然吾自成之体系，说事明理，能懂者几何，能超然坐而论道者几何？世上大学问几何？何谓大学问？必以天下为论，纵横捭阖，简易透彻而得天下之道，并以天下之事证之。由此方得天地之心，学问之心，亦得吾之心，得自我之心，终也近乎道成乎佛乎？！然大学问之所成，谈何容易？！

冬一日日高，于石城闲坐，见友人之友来访。笑而问好，坐而慢语，疏疏朗朗，略略大方，竟然有出尘之意。大千世界，凡尘人心，历史过往，生民立命，天下太平，隐隐竟有承往继绝之志。数面之缘，竟然心意合一，无一不契，引以为忘年之交。非以承我之心，而承天下共同之心，感而慨之，为之作歌：

彼凡人兮，不意向道。所得道兮，世人欢笑。他人或讥，君子自宝。初心不改，不悔不懊。华华篇章，不乐不骄。默默耕耘，不计辛劳。彼何人兮，何异尔曹？！在世脱俗，何所以要？兼爱非攻，墨子未老。上上伐念，孙子

不考。彼书生兮，弭战未兆。

此友人者何？中国银行方明是也。早年就学北师大，后求学北大，获博士学位。先驰骋于全球金融市场，后退而深耕，数年之间，有全球金融风暴、全球货币战略诸著问世，盖皆以全球眼光寻求中国重建全球货币秩序之道。数据完备，论述周详，个中艰辛，何足道哉！近年进以大谦之心，以大毅力，与几位同事完成了关于《“安倍政治经济学”——一道世界主义的鸿沟》一书，以之求序。方外之人，久不言语，亦无谓影响力，甚觉为难。本欲为拒，但念著书之苦，书之立意深契我心，犹豫再三，遂有如下文字。为便大家阅读，如下转为今文：

日本问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说日本问题重要，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日关系复杂且重要，二是日本国际化挫折的经验教训重要。因为日本问题重要，安倍晋三先生当选首相后推出的“安倍经济学”，以及“安倍政治学”，或者本书所称的“安倍政治经济学”，才会引起大家的极大兴趣。除了追踪热点似的报道外，有学者愿意花精力去做系统的研究，非常必要和难得。

对于日本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不小的进展，除了中日关系紧张导致的社会情绪之外，就日本经济研究而言仍然存在两个倾向：一是系统性分析的较少，尤其是对日本进行历史性的系统分析较少；二是立足点较为本位，多以中国发展的局部需要为主，如大家都比较关注日元升值、日本的房地产和泡沫经济问题，这是因为中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本书的作者们选择了日本这一重大问题，运用了历史的系统性分析方法，从日元国际化困境、财政货币政策困境、金融体系国际化困境、产业国际化困境和人口困境出发，认为日本经济问题在于其国际化的失败，“安倍经济学”难以带领日本走出国际化困境，反而可能给日本的未来发展埋下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祸根。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安倍经济学”，让我们看到了“安倍经济学”热背后的整个日本面临的问题，以及“安倍经济学”的可能后果。对于了解和把握“安倍经济学”的未来，了解和把握日本经济的未来，这种分析应该说较为透彻。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们将日本问题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背景之下，

放到了各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化的历程之中，从而总结出了一国经济发展到国际化的几个阶段，包括一国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化、国际化挫折和再度国际化等四个阶段，并进而将中国定位为经济快速发展后的国际化阶段。通过历史的研究，作者希望中国能少走弯路，成功地国际化。因此，本书对日本国际化的挫折和经验教训的深入分析，对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背后，方明博士以其全球一价率的思考，试图建立国际化问题的价格参照体系，不管是他们应用美国 GDP 平减指数对全球购买力平价（PPP）的修正（因为在 IMF 的统计中，美国的 PPP 始终是 1），还是提出的经济潜力空间比值，还是相应的经验参考值及其含义，都非常有价值。而且，作者利用这一架构分析日本问题，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国际化发展，也具有参考价值。修正后的 PPP 和浮动汇率体制的关系是什么，浮动汇率体制能否有效起到减震器的作用，或者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起到减震器的作用，作者在本书中并没有进一步地探讨。但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日本问题当然不仅仅包括经济问题，也包括政治问题，还包括文化问题，于是有“安倍政治学”的说法，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安倍政府处处与中国为敌，从钓鱼岛到南海处处挑起事端；二是在历史问题上不断挑战中国和世界的认知；三是安倍政府极力修改和平宪法，试图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如何看待日本的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以什么样的角度和框架来分析日本面临的问题，对于日本，对于中国和世界，都十分重要。作者提出了“安倍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来试图综合“安倍经济学”和“安倍政治学”的内容。的确，看日本经济问题不能脱离其政治文化背景。如果说“安倍经济学”将导致日元以邻为壑地贬值，“安倍政治学”则将挑战中国的安全，并促使日本突破和平宪法走向军国主义，那么，“安倍政治学”必然冲击“安倍经济学”的效果，甚至会毁了日本的未来发展。那么，日本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呢？

作者从世界主义出发，对于 21 世纪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文化和政治体制格局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对于一些重大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如提出

了 21 世纪全球地缘政治的融合趋势，意识形态的趋同与和解可能，和平与发展与民主与自由的有机结合，未来的政治体制将走向良治和宪政民主的结合。毋庸置疑，作者试图解构争斗性的地缘政治理念、民主意识形态霸权、东西方文明的冲突等话语体系，化解长期以来在国际关系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方面的西方理论支配权，提出了全球融合的世界主义观点。这种努力和尝试具有重要的价值！

对于 21 世纪的全球经济格局和金融货币格局，作者结合历史数据进行了长时距的推导，对于中国、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在 21 世纪全球格局中的地位，作者们进行了较为恰当的假设和说明，相应的分析是严谨和合理的。作者对于中国 21 世纪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不过，作者也没有得意忘形，而是在思考，在 21 世纪的全球大格局之下，中美日如何自我定位，才能更有益于人类共同体发展这一大命题。在这一大命题的追问中，作者分别就美国、中国和日本全球地缘政治战略、政治体制发展、经济金融与货币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建议。细细读来，这些建议的一些细节可能值得进一步商榷，但是，这些建议的大方向，对于人类共同体的发展，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对于美国和日本的未来发展，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事实上，在这样的世界主义分析框架下，不仅中美日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世界各国也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人类文明也将在融合中不断提升！

全书读来较为流畅。不管是对日本问题的理解，还是对人类问题理解，这些我们思考过或没有思考过的问题，作者进行了独特的探索，提供了独到的答案。对于读者而言，当然也是莫大的启发。而且，不管是数字和推理，作者的语言没有凝滞之感，在理性中蕴涵着澎湃的激情，有较好的可读性。更为难得的是，作者用民主的一维化度量思维，将政治体制进行民主化度量，试图解决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这种思考是有价值的，尽管具有典型的调和特点，但何尝不接近于中国当前最真实的需求？！

当然，文中的观点尽可以进一步探讨和提升。但是，作为近一个阶段的研究成果，足可以提供给大家阅读、思考和讨论。

以上言罢，意犹未尽，再接古文曰：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如若知兵善战当然国家之幸！然对于世界而言，战争必生灵涂炭。所谓大兵过后，必有灾年！战争必埋下仇恨之根，遂绵绵不绝，或周期再现！此当然不利人类之交往，遗害人类共同之世界！故人类生活之常态，绝非一国避战或战胜他国，而乃不战而融合发展。

自古知兵非好战！孙子言用兵之法，全国、全军为上，并言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全民全族亦当然之义！然何以全国全军，何以全民全族，何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言庙算，言上兵伐谋，言其次伐交。谋者为何？非仅养兵、用兵之谋，亦当有国家发展之谋，皆以为重！进而言之，世界之全，人无地分、族分、国分、教分，必也兼爱、非战乎？！

然战不可自止。何以止战？贵在不起或消弭战争之念。人类之非战而融合发展，必由之观念。战争乃利益之争，利益之争常属意气、想当然和短视耳！意气之争等，皆发乎观念。因此，观念之争、之协调、之融合，方是消兵弭灾之要！而观念之协调融合，终乃促共同成长、相互依赖！故观一而敌十万百万兵者，消弭兵祸者，伐念是也！故曰：上上者伐念。此岂非扁鹊医于未病，老子所言无为而无不为乎！

当今世界，自以为是之观念、孤立之观念、霸权主义之观念，比比皆是，岂人类之福哉！方明此书，以世界主义为出发点，试图站在更包容之人类共同体之未来，为中国与世界之和平发展寻求理论基础，消弭东西方世界众多不当之理论与观念之冲突，既弭人类战争之源念，亦促人类共同体之未来发展。书生无缚鸡之力，念念天下。此心此力，煌煌乎可观！虽不求万世名，庶几或益于今世后世，或孰不念哉！大矣哉，放眼天下，或人皆同此心乎？！如是，幸甚！

天地契阔，变动不羁。吾辈之人，秉心求索。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并非以之哗众取宠。超越一门一科之学问，盖中国传统系统思维之必然。今广为推崇之学问，以西方学科为标准，且不言西方或以学问为制脑权之手段，仅言学科与问题解决之距离，便知系统思维、融会贯通何等之必要！对于当今中国之改革，对于中国之国际化，对于中国之全球

经营，对于人类共同体之发展，此书之尝试，当鼓当歌。吾之为序，何幸之有！

是为序！

西湾野老

给本书写序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这可以从书名上看出端倪。传统上，讨论“安倍经济学”是经济学家的工作，而讨论“安倍政治学”则是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议题，将这二者加在一起，成为“安倍政治经济学”，则因跨学科交叉而复杂困惑，而从一种世界主义的角度进行评判，则因跨历史跨国国际，更使人有力所不逮之感。

但掩卷长思，似乎觉得作者这样处理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日本经济向来极具跳跃性从而富有戏剧感。而这与其特有的社会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日本是儒教文化国家，其经济体制与结构一如中国，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是其基本特征。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东方大门，日本也面临着沦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险，有别于其他亚洲国家，日本全国发奋，师夷之长，“脱亚入欧”，展开了“明治维新”，走上了以工业化为基本内容的现代化道路。

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及日本国情，日本的工业化极具特色，是以对外扩张为目的的军事工业化道路，富国强兵是基本诉求，并产生了以“武士道”为标志的军国主义政治社会结构和文化追求。在军人政权的刺刀下，对外通过战争来掘取资源，对内通过强权来压制消费，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资本积聚格外加速，工业化快速进行，最终，“以战养战”成为这种工业化模式的

鲜明特征。曾几何时，大日本帝国横行太平洋，将数亿亚洲人民蹂躏于其铁蹄之下，而其结局也十分明瞭，军国主义的崩溃使经济陷入凋敝之中。

二次大战，在东方以日本法西斯的覆灭而结束，日本为美国所军事占领。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得益于日美安保条约的卵羽之荫，秉承重商主义的衣钵，无军费之忧的日本倾心于经济发展，出口第一，以经济立国，形成了政商合一、银企合一的裙带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从外部看，这种体制具有强大的经济动员和组织能力，从而极具竞争性。借助于这种体制，日本经济在战后短短的二三十年间迅速崛起，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时间，日本产品风行世界，日本称霸全球的态势令人可畏。但是从内部看，日本这种体制是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从而极具脆弱性。还在日本第一尚未绝耳之际，泡沫经济破灭，“平成危机”使日本失去了二十年，日本模式的魅力似又荡然无存。

为挽救泥沼中挣扎的日本经济，日本祭出了“安倍经济学”。所谓“安倍经济学”的目标是通过超常规的经济政策刺激，使日本经济走出长达二十余年的通缩，实现经济增长并在此基础上，引导经济转型，提升国家实力。具体而言，它由三只箭构成，即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和日本经济复苏计划为基本内容的经济成长战略。这三只箭的核心基础是通过极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创造通货膨胀预期，带动消费和投资，以改变日本经济现实的增长路径。为保证“安倍经济学”的成功，需要借助国家的政治动员能力。而“和平宪法”使日本不能成为“独立自主的正常国家”，妨碍了其政治动员能力，这充分体现在安倍在其《致美丽国家》一书的阐释上。大国化的“新国家主义”构成了安倍政治学的主要使命，而修宪构成了“安倍政治学”的主要诉求。安倍政府企图改变二战后世界格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孤注一掷的“强心针”政策既反映日本现实经济的无奈，也充分体现了日本文化特征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赌徒心理。它虽可能奏效一时，但长远却令人担忧。因为这是累卵之技。这一累卵的过程可简单的表述如下：“安倍经济学”不同于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它不与充分就业挂钩，却与通货膨胀挂钩，政策立足点是推动通货膨胀率达到2%。且不说，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如果一旦实现，日本经济或许会有更大麻烦。2012年日本国债占GDP的比

重已达 238%，预计随着“安倍经济学”的推行，这一比例将会达到 250% 以上。日本的实际利率几乎为零，届时，当通货膨胀达到 2% 时，即使日本仍维持实际利率为零，这意味着日本国债的票面利率要达到 2%，如此其一年国债利息负担至少要达到 GDP 的 5% 以上（ $250\% \times 2\% = 5\%$ ）。我们不知道“安倍经济学”有何威力能使日本经济增长维持在 5% 以上。如果不能，日本的国债很可能面临如同今日欧债之尴尬。

回顾日本百多年的经济史，跌宕起伏，既有在废墟中崛起的经验，更有在辉煌中崩溃的沮丧。反反复复，令人扼腕，不啻为世界经济史中的一个异数。日本经济为什么会这样？经济学家曾做过不胜枚举的分析与评论，并注意到一个事实：日本政治社会的独特性极大的影响着其经济的发展过程。日本经济现代化了，但日本政治社会却并不具有全然意义的现代化。换言之，日本是经济的“巨人”，却是政治社会现代化的“矮子”。这种格局奠定了日本重商主义的基础。奉行扩张性对外竞争策略，政府深度介入经济活动，政商合一，产业政策成为其标志，鼓励“国家至上”的大和精神，社会和家庭生活高度纳入经济轨道，“经济动物”成为其代名词。因此，即成就了“日本奇迹”，同时又成为其衰败的根源。于是，从更广阔的视野，而不仅仅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审视日本经济，从全球化的角度，而不仅仅局限于国别来剖析日本问题，就成为研究日本经济十分自然的选择。因此，应该说本书具有独特的视角，而且具有合理性。

二

日本经济的戏剧性首先源于其特有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对此，社会科学界已有广泛的共识。但是其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如何丝丝入扣的结合，形成机制化的运作，则还需要认真描述，这构成了本书的写作起点。

二次战后，日本经济开始在废墟中重建时，世界早已进入以主流工业技术进行标准化大规模制造的时代。其标志就是以冰箱、电视特别是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广泛进入家庭，而制造这些产品生产方式的典型代表就是“福特生产方式”。

所谓“福特生产方式”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创立的生产方式。区别于过去单个通用设备全面加工的分散性生产，福特汽车今可用专用性的流水线将生产活动统一起来。由于使用专用生产线，可以将产品生产分为零件、部件以及总装等不同生产部门，细化了产品内分工、提升了效率；由于使用专用流水线，可以将每个零部件生产的工艺标准化，不仅使机器设备可以更精确的加工，而且使工人的动作也一致化，减少了失误，控制了质量，由于使用专用流水线，节省了通用设备多余的功能，从而减少了固定资本开支，增进了单位投资的效益。边际成本的下降和边际产出的上升，使福特汽车公司的拳头产品——“T型车”产量不断提高，售价不断降低而风行世界，进而也将其流水线生产方式带向全球制造业，形成了主流工业技术进行标准化大规模制造的工业规范。

但是，“福特生产方式”也不是无懈可击的。首先，由于零部件众多，如果对外协作生产，统一标准规格，控制质量十分困难，一个十分自然的选择就是多采用自己生产以降低外购比例。其结果，为达到规模效益，需要巨额投资，这对资本匮乏的国家形成挑战；其次，由于零部件众多并分别生产，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物流管理的难度，周转库的增多以及库存的增加，降低了资本的使用效率。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生产方式是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篮子里，一旦市场改变或生产标准变化，其专用性的流水线便一无用处，因资本沉没而损失巨大。福特汽车公司的“T型车”就是一例。T型车是应当时公路条件设计的。因沙石路面，高低不平，T型车的底盘较高，并因重心较高，而行驶速度较低。二次战后，各国的公路相继由沙石公路硬化为黑色路面。路况的改善使对速度的追求显现，T型车因之也需要改型。但由于T型车零部件90%左右都是自己生产的，改型不仅困难，而且意味巨大的资本损失。曾经称霸一时的福特汽车公司在改型中衰落，被后崛起的通用汽车公司所赶超。

二次战后，日本工业的崛起，从微观上看是得益于更有竞争力的“丰田生产方式”。丰田同样生产汽车，在汲取福特生产方式优点的同时，又有新的创新，形成了以零库存的实时生产（just in line）为标志的新的企业管理样板。如前所述，如果将福特生产方式中的零部件分散出去，通过外协采购，则可

节省固定资本开支；如果能降低库存，减少零部件周转，则可节省流动资产开支，两项加总则降低了投资门槛，提高了效率，在边际成本进一步下降的同时，收益也将提高。这构成了丰田生产方式的竞争力的秘密。于是，汽车工业的老家在美国，但日本汽车却可以同等质量，更低的售价畅销美国，同理，以这种生产方式崛起不仅是日本汽车业，还有白色家电，黑色家电，“日本制造”成为席卷全球市场的旋风。

然而，用丰田生产方式来进行主流工业技术的标准化大规模制造的诀窍并不在于经济学的原理，而在于管理学的实践。如何使外协零部件按一流的标准规格流程进行生产，即全面质量管理，同时又能在物流上予以精确控制，最大限度地节省流动资金，即实时生产，这都有赖于包括经济社会体制在内的一整套机制首尾衔接的运行。

日本文化崇尚集体主义，提倡大局意识。在企业内部，它内化为“团队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企业利益，为企业成长献身，并为此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具有等级特点的年功序列制，并终身雇佣。在此基础上，流程导向管理成为持续的，短期的作业绩效成为长期的竞争策略。在企业外部，它外化大小企业间的“协作精神”，并为此形成了日本特色的“下承包”制度。在上下游之间，龙头大型企业将零部件分包给小企业，这种分包不仅仅是订单合同，还包括生产标准，工业流程，及模具工装设备等一系列技术支持，使各个分包企业按照订单进行精确高度及时的生产。形成了日本首倡的供应链管理，随着这种供应链的延伸和扩展，日本的所有企业，乃至作坊都被有机的整合在一起，形成有机的生产体系。这特别表现在这些企业自发性合作的产业联盟，试举一例，向丰田汽车公司提供零部件的本身的供应商企业自发组织协会，成员有近 200 家企业，而为丰田汽车公司采购的 80 家企业自发组织“荣丰会”共同探讨寻求丰田汽车发展的最佳路线。

在这一体系中，孕育出日本独特财团模式。所谓财团模式是“产商融”结合。其核心是综合商社，综合商社既拥有各个企业还是贸易公司，同时又是金融控股集团，它是以贸易为平台，介入了产业内部，并提供金融服务。尤其是其金融服务有别于单纯的金融机构，不仅兼具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功能，还对关联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安排。这种财团模式从股权结构上看是“交

叉股权”，相应地从治理结构上看，则是“裙带关系”的内部人控制，并因之从决策程序上看，是集体决策方式。

围绕着财团模式这一基础，日本的金融体制也逐渐发展成为“主办银行”制度。如果说财团对关联企业的融资还主要体现在短期流动资金方面，那么日本银行的责任则是提供长期的生产资本。为此不仅有政府设立了复兴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输出入银行，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而且一般性的商业金融机构也分工明确，限于特定领域，城市银行对大企业提供融资安排，而地方银行则负责小企业的融资安排。更为重要的是，各金融机构通过持股或派驻董事等方式进入企业内部，在满足企业资金需求的同时，加强对企业的监督。

围绕着财团模式这一基础，日本政府也逐渐形成“经济内阁”的行政体制，其典型代表就是“产业政策”并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通产省。所谓产业政策就是根据日本经济的发展需要，确定优先发展顺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制定“倾斜生产方式”，“重点生产方式”以及“产业合理化”等行政手段优先保证需要发展行业的资金安排，原材料供应，市场推广以及其他生产性服务。

由上，日本的文化特质、社会结构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与其经济体制相互缠绕在一起，表面上与经济活动并不直接相关的经济外因素内化为经济活动的支撑因素，使其无论在微观层次，还是在宏观层次将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但现实经济上难以实施的操作丝丝入扣予以落实，从而形成极强的产业动员和组织能力。如果将这一能力倾斜于一个或数个产业，将会产生巨大的竞争优势。二次战后，日本相对弱小的幼稚产业，如汽车、冰箱、电视等无不因此而令人瞩目的发展。

但是，日本这种体制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当举国之力，聚焦一点，固应可获得超常规的发展，然而，不及其余则使其经济系统不具有弹性。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缺少弹性的经济系统更为脆弱，更难应对风险。日本经济未来的衰落也能从这里得到解释。试举一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通信领域模拟技术似占上风，而日本又领风气之先，但与此同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通信技术初见端倪，为巩固日本在模拟技术的优势，日本不惜重金背水

一战，强化模拟技术发展。然而，在数字技术岿然成风的势头下，模拟技术终成昨日黄花，逆潮流而动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衰落，其结果不仅曾雄踞一方的巨无霸企业——NEC 风光不在，而且日本在电子产品的领先优势也随之削弱。

由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若使日本经济常态化，从而可持续发展，其经济体制重塑十分重要，而这又有赖于其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使日本政治社会具有“现代性”依然还是个挑战。这是本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三

日本经济的戏剧性还源于其特有的外倾性。从历史上看，19世纪中叶，近代工业开始引入日本。为加速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对内形成了“举国一致”的资本积累动员体制，对外，则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通过战争来掠夺资本。事实上，日本的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于中日甲午战争，大清战败赔款使其工业化的资本基础开始巩固。从现实看，二次战后，出口第一，追求顺差的重商主义是日本的基本国策，并为此奠定了一整套体制与政策安排，并切实予以贯彻，形成了前所述及的包括社会政治在内内生的机制化的运行。外倾性因此而构成所有研究日本经济问题所无法回避的日本特色。

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经济的外倾性不仅仅日本一国的的问题。由于日本经济的外倾所造成了“溢出效应”，深刻地影响着亚洲地区的经济结构及金融安排，进而影响着世界。反过来，因日本经济“溢出效应”的“溢回”（spill back）又深刻地影响日本经济的未来。这种交互影响构成了本书的分析角度。

如前所述，二次战后，日本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体制具有较强的动员能力，产生了巨大的产业竞争优势。那些曾由欧美原创的产品和制造技术，如汽车、家电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成为日本产业的象征，不仅行销世界，而且制造技术领先。在这一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亚太地区产业国际分工格局——雁行结构。

从国际贸易和投资上观察，日本企业掌握着以欧美为代表的最终产品的市场，其竞争优势是品牌和销售。由于对市场的占有，使其可以将生产环节向世界，首先是日本周边的亚太地区延伸，其延伸的深度与广度取决于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生产要素成本的构成。反映在日本的对外投资上便是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提出的顺贸易导向性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即“边际成本比较优势论”。从国际分工上观察，日本本土企业为头雁，掌握着上游的产品和研发，其次为韩国和台湾地区。凭借制造技术为日本产品做配套，处于后雁的是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为日本产品组装，形成亚洲地区的垂直或纵向以制造业为主的国际分工。从国际金融上观察，与这一垂直或纵向的国际分工的产业链相适应，金融安排是依托于产业上下游的内在关联的供应链融资。这也使亚太地区金融结构呈现出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单一性。

将上述特点综合起来，所谓“雁行结构”本质上是日本企业为雁头的亚洲地区产业链体系。这一体系的稳定和发展的核心取决于日本企业“头雁”的领飞能力。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日本企业的技术高度。如果日本企业技术不断深化，不仅其产业链条不断向海外延伸，而且后雁企业会分享技术进步红利，这一技术高度既意味着现有的主流工业技术的细致化，以增加分工的可能性，更意味着日本企业必须有创新能力，原创技术源源不断，推动新产品、新产业的出现和发展；第二，日本企业产品销售的广度，核心是其市场占有率。如果日本产品行销世界，并且占有率不断提高，则后雁企业会分享规模效益红利。如果日本产品行销海外的能力不足或减弱，为维持后雁企业的生存，日本就需扩大进口，以内需来保证市场占有率。

由于这一“雁行结构”的稳定性高度依赖于头雁的领飞能力，从而亚洲地区的产业链体系存在着—损俱损，—荣俱荣的系统性特征。一个最新的证据就是2011年3月日本东北部海域大地震及其海啸，日本的产业受到冲击，而以半导体为代表的日本电子产业的生产中断，致使全球产业链受到打击，相应地，亚洲地区为日本服务的产业也随之遭受损失。

亚洲经济发展表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日本企业的头雁领飞能力较强，“雁行结构”对亚太地区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并带动了亚太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但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日本企业的头雁领飞能力明显